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徐映梅 夏 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统计与数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变化,发现中国存在“收入—幸福悖论”现象。构建一个基于人口学、经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和情感等因素的综合框架分析发现,这些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经济、家庭、工作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收入高、信任家庭、对工作满意、人际关系和谐、情感积极的人幸福感较强。这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大力推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科学协调好发展经济与满足居民不断提升的多层次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而切实增进居民幸福感。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收入;工作满意度;家庭信任度

中图分类号:F1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14)02-0012-08

一、主观幸福感研究回顾及分析框架的提出

早期关于幸福感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心理学和哲学领域,认为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包括基因、性格、价值观等。20世纪后半期兴起了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随着经济学者介入幸福感的研究,内容逐渐丰富起来,形成了三种比较有影响力的假说:

第一种是基于绝对收入的幸福感假说。在早期的经济学研究中,通常用“效用”来衡量个人的福利水平。在效用函数框架下,随着经济的增长,人民的幸福感会增加是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因为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人民更富裕,有能力消费更多的商品来提高他们的效用水平。直到1974年Easterlin通过对二战后美国的幸福感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虽然美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实际人均收入也显著增加,但人民的幸福水平并没有显著提高,于是提出了著名的“收入—幸福”悖论^[1]。这也引起了很多学者对“收入—幸福”之谜的关注。后来学者们通过不同的样本对幸福悖论进行了检验和分析,得出一个具有规律性的结论: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随着经济的增长,幸福感并不会增长;而在发展中国家和贫穷的地区,随着经济的增长,幸福感会随之提升,原因是收入的幸福边际效应递减。

第二种是基于相对收入的幸福感假说。相对收入理论对幸福感为什么不随收入的增加而提升做

收稿日期:2013-12-3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基于经济效应视角的人口政策评估与选择”(12YJA910006)

作者简介:徐映梅(1965—),女,湖南益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夏 伦(1985—),男,湖北孝感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博士生。

出了有力的解释,即人总是具有攀比性:和他人比、和自己的预期比,即使收入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这种提高不及社会平均收入提高的幅度,或者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预期,人们就会失落,幸福感不增甚至可能下降。Stutzer 认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中,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更加显著^[2]。谢识予等对上海市的样本分析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他们发现在控制了诸如性别、婚姻、社保等因素后,绝对收入和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显著的关系^[3]。针对这种现象,“幸福悖论”的提出者 Easterlin 也进行了研究,发现控制其他因素后,幸福程度和自身的绝对收入水平正相关,但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负相关^[4]。罗楚亮根据 2002 年城乡居民入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但相对收入的影响更大^[5]。田国强等基于“攀比理论”建立个人效用模型,结论表明存在攀比效应时,收入的增加在一定阶段内会提升个人效用,当超过某个临界值后,效用可能会下降^[6]。

第三种是收入因素之外的幸福感假说。除收入因素外,诸如人口学因素、工作因素、情感因素、家庭因素等都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在人口学因素中,多数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幸福,原因是男性往往承担的责任更大,心理预期较高,也有学者研究表明男、女主观幸福感没有明显差异。孙凤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性别、职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职业女性比男性有更高的工作幸福感和更低的生活幸福感^[7]。从年龄来看,很多研究表明老年人幸福感较低,因为老年人往往身体健康状况较差,面临“老、病、死”的可能性较大,但 Easterlin 研究发现,老年人幸福感较高,原因是老年人的生活压力较小,期望较低,更容易得到满足^[8]。关于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几乎一致认为健康状况糟糕的人幸福感较低。婚姻因素也是值得关注的,多数研究支持婚姻可以促进幸福,独居、离婚或丧偶的人幸福感较低。从工作情况来看,Clark 等认为失业会显著降低幸福感,失业给人带来的损失不仅仅体现在收入上,挫败感、失落和声誉等精神层面的影响会更大^[9]。Diener 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度的一种感受和评价,包括对工作、家庭等众多因素的主观感受^[10]。

综合现有研究结果可知,性别、年龄、教育、健康、婚姻、就业状况、收入、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等是解释幸福感的重要变量。我们归纳这些重要的影响因素,认为可以将其分为六类:人口学因素、经济因素、工作因素、家庭因素、人际关系因素和情感因素。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几乎面面俱到,然而具体到某一个研究,往往只分析了一两种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没能全面展示多种因素对幸福感的综合影响,而且众多学者的研究是基于不同的样本,其结论往往不宜直接比较。鉴于此,本文提出基于上述六类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具体如下:

第一,人口学因素假设:(1)整体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加幸福;(2)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3)健康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身体健康的人比不健康的人更幸福;(4)婚姻可以提升幸福感;(5)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幸福。

第二,经济学因素假设:(1)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均有影响,且收入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2)家庭储蓄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有储蓄的家庭比入不敷出的家庭更幸福。

第三,工作因素假设:工作状况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对工作状况越满意的人,幸福感越强。

第四,家庭因素假设:(1)对家庭成员信任的人比不信任家庭成员的人更幸福;(2)对家庭生活越满意的人幸福感越强。

第五,人际关系因素假设:觉得大部分人是可信任的人比觉得需要处处提防的人更幸福。

第六,情感因素假设:(1)时常觉得孤单或脱离群众的人幸福感较低;(2)情感积极的人比消极的人更幸福。

本文试图从上述六个因素出发综合考察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验证上述假设是否符合现阶段的中国实际情况。

二、中国居民幸福感现状

(一)幸福感^①的测量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主要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整

体评价,决定人们是否幸福的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而是人们对于实际情况在情绪上做出的反应。由于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没有客观标准,所以其测量较为困难,现在通常采用的测量方法是自陈量表法,即通过问卷设置问题来获得,例如:“总体来说,您感觉自己幸福吗?”,而回答的选项则有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十分法等多种形式。那么仅用一个问题来测量一个人的幸福感是可信和有效的吗?Wilson 通过对比主观评价和专家评定的结果,发现绝大部分专家评定的结果和主观评价的结果具有相似性,表明上述测量有效^[11]。另外,Easterlin 通过长期的研究证实,通过提出问题来测量幸福感,具有研究价值,其测量结果可以用来进行跨文化和跨群体的比较研究^[4]。

(二)数据来源

国内学者主要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对主观幸福感进行分析^{[5][12][13]},本文采用的数据为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WVS)。世界价值观调查是一项考察全世界居民对朋友、家庭、婚姻、工作、政治、社会信任、宗教等多方面价值观念的国际性调查项目。该调查在1990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对中国进行了四次调查,样本容量分别为1 000、1 500、1 000和2 015人。为了评估的客观性与国际可比性,本文主要采用世界价值观数据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幸福感总体变化趋势部分会用到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验证世界价值观数据结论的可靠性。

(三)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情况与变化趋势

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中,有两个描述主观幸福感的问题,第一个是“整体来说,您自我感觉快乐吗?”选项答案为“1.非常快乐,2.比较快乐,3.不快乐,4.一点也不快乐”(取值越低越快乐),第二个问题是“总体而言,您对生活满意吗?”选项答案是从1(最不满意)到10(最满意)来描述满意度(取值越高,对生活越满意)。根据表1可知,1990~2007年每年的快乐均值都在2左右,没有明显的变化,整体均值为2.04,表明总体上居民主观感觉是快乐的。我们将1990年和1995年的数据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代表,可以得到其快乐均值为2.00;将2001年和2007年的数据作为21世纪初的代表,其均值为2.10,可以看出中国居民的快乐感是下降的。从生活满意度来看,1990年为7.29,是最高的,1995年、2001年呈现下降趋势,2007年略有回升,若将21世纪前后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生活满意度也呈现下降趋势。

在WVS数据中,快乐程度和生活满意度均可以作为主观幸福感的近似代替,本文为了研究的方便,将两个变量合并成一个变量,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主观幸福感可以分解为两个主要因素:情感认知和生活满意,分别和WVS中的快乐程度与生活满意度对应,合并两个变量的方法采用Inglehart提出的方法,即“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2.5×情感认知^②”^[14],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综合考虑了两个因素的主观幸福感变量,记为SWB,该变量取值范围为-9~7.5,虽然出现了负值(类似情况见表2),但数值仅仅表示幸福的等级,可以看作有序变量,并不影响后续的分析。表1中主观幸福感列出的数据为该变量的均值(均值越大,幸福感越高),数据同样证实了居民在20世纪90年代比21世纪初更幸福,在2000年后,幸福感呈现提升趋势。针对主观幸福感的这种阶段性的变化规律,我们给出如下解释:第一,居民幸福感的均值变化并没有明显的上升或者下降趋势,而是在小范围内波动,是由于人具有适应生活的本能,人们总是会在不断变化的生活水平中适应当时的环境,所以幸福感表现稳定;第二,相对收入理论确实在现实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虽然20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收入大幅提高,但人们的攀比心理使其并不觉得幸福感提升,反而可能会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下降;第三,人们对幸福感评估时基于多要素的综合考虑,一方面生活水平的提高确实能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但那些没能与经济同步发展与改善的因素诸如环境污染、社会不公等负面现象的频繁出现又会抑制幸福感的提升,人民对幸福的评价是综合各种因素后的整体感受,取决于正面与负面因素的力量对比,从2000年后的这几年幸福感小幅上升的趋势来看,正面因素是主导因素。

为了进一步对比,我们观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结论,其问卷问题为“总的来说,您生活感觉如何?”选项为“1.非常不幸福、2.不幸福、3.一般、4.幸福、5.非常幸福”。2003~2008年,居民的幸福感

表 1

主观幸福感总体变化趋势

WVS			CGSS	
年份	快乐程度	生活满意度	年份	幸福感
1990	2.05	7.29	2003	3.26
1995	1.95	6.83	2005	3.41
2001	2.13	6.53	2006	3.43
2007	2.06	6.76	2008	3.71
综合	2.04	6.84	综合	3.45

注:表内数据为均值。

呈现逐渐上升趋势,表明进入 2000 年以后,居民越来越幸福了,这和 WVS 的数据结论(2007 年比 2001 年更幸福)相一致。

三、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一)变量选择

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分析是基于前文所提出的综合分析框架。因变量为主观幸福感,为离散有序因变量。自变量包括人口学因素、经济因素、工作因素、家庭因素、人际关系因素和情感因素等六个因素,各个因素的变量设置具体如下:

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具体分类见表 2。

经济变量包括:收入(按绝对收入进行分组,分为低、中、高三个收入组别)、储蓄(按去年储蓄情况分为四组:有储蓄、收支平衡、有储蓄的借钱消费、无储蓄的借钱消费)、家庭财政满意度(财政满意度是将家庭实际财政情况与心理预期情况以及和其他人财政情况对比后的一种主观感受,可以作为相对收入的一种近似替代,从最不满意到最满意分别用 1 到 10 来衡量,本文为了结论方便表达,将 1~3 重新编码为 1,代表不满意;4~7 编码为 2,代表一般;8~10 编码为 3,代表满意。后文涉及满意度的变量均采用此处理方式)。

工作状况变量:工作满意度(工作满意度是居民综合各种工作因素后对目前工作状况的一个主观感受,变量值与处理方式同家庭财政满意度)。

家庭因素变量包括:家庭信任度(衡量居民对家庭成员整体是否信任的变量,变量值为:1.非常信任、2.比较信任、3.一般、4.不信任)、家庭生活满意度(此变量是综合考虑家庭各种因素后的一种主观感受,变量值的处理方法同财政满意度)。

人际关系变量包括:信任度(此信任度主要指对非家庭成员的信任,问卷问题为:大部分人能被信任吗?回答选项:1.大部分人可以被信任、2.还是小心为好)。

情感因素:孤单(问卷问题:您是否感到孤单或脱离群众?回答选项为:1.不、2.是)、积极情感(问卷问题:您是否感到兴奋和兴趣,回答:1.不、2.是)、消极情感(问卷问题:您是否感觉沮丧和失落?1.不、2.是)。

(二)不同群体主观幸福感差异的比较

对不同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比较可以粗略地揭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限于篇幅,描述性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从性别来看,单独比较每年,除 1995 年女性幸福感明显高于男性外,其他年份差异并不明显,而从总体来看,女性的幸福感均值 1.80 高于男性的 1.67,表明女性整体上比男性幸福。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的幸福程度最高,未婚次之,离婚和丧偶的最低,表明婚姻可以提升幸福感。从年龄来看,整体上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 U 型关系,30~49 岁中年人幸福感最低,原因可能是这部分人处在工作压力大,且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负担相比其他年龄段要重很多。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幸福感也显著提升,表明教育可以使人更加幸福,原因可能是受教育更多的人往往会有较好的工作,不错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同时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更可能有正确的价值观,

需要注意的是,2001 年出现了反常的情况,高中和中专的幸福感最强,大专及以上的最弱,可能的原因是当时大学恰逢扩招时期,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使得当时大学生的优越感大幅受挫,幸福感降低。从健康状况来看,很健康的人比普通的人要更幸福,普通的人比健康差的人更幸福,且差距非常明显,可以看出,健康是影响一个人幸福与否的重要因素。从工作情况来看,退休的人的幸福感最高,有工作的次之,无工作的最低,这是符合现状的,退休的人压力比较小,相对幸福,无工作的人压力非常大,难言幸福。从收入情况来看,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表明收入依然对幸福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卡方检验结果来看,除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他变量均显著。

表 2 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有序回归估计结果

因素	变量	类别	估计值	比数比	拟 R ²	卡方检验值
人口特征	年龄	15~29	-0.451***	0.64	0.127	597.04(0.000)
		30~49	-0.513***	0.60		
		50岁及以上	参照组			
	性别	女	0.254***	1.29		
		男	参照组			
		未婚	0.076	1.08		
	婚姻	已婚	0.299**	1.35		
		离婚或丧偶	参照组			
		好	1.937***	6.94		
	健康	普通	0.983***	2.67		
		差	参照组			
	教育	大专及以上	0.486***	1.63		
		高中及中专	0.246**	1.28		
		初中及以下	参照组			
经济因素	收入	高收入	0.340***	1.40	0.367	1 775.179(0.000)
		中收入	0.459***	1.58		
		低收入	参照组			
	上年储蓄	有储蓄	1.075***	2.93		
		收支平衡	0.578***	1.78		
		有储蓄借钱	0.577***	1.78		
		无储蓄借钱	参照组			
	财政满意度	满意	3.295***	26.98		
		一般	1.536***	4.65		
		不满意	参照组			
工作情况	工作满意度	满意	1.938***	6.94	0.153	148.709(0.000)
		一般	0.604***	1.83		
		不满意	参照组			
家庭因素	家庭信任度	非常信任	4.089**	59.68	0.178	188.421(0.000)
		比较信任	3.605*	36.78		
		一般	4.031**	56.32		
	家庭生活满意度	不信任	参照组			
		满意	2.396***	10.98		
		一般	0.975***	2.65		
		不满意	参照组			
人际关系	对外人的信任度	能信任他人	0.351***	1.42	0.01	51.995(0.000)
		小心些为好	参照组			
情感控制	孤独	不	0.331*	1.39	0.059	57.193(0.000)
		是	参照组			
	积极情感	是	0.498***	1.65		
		不	参照组			
	消极情感	不	0.839***	2.31		
		是	参照组			

注:参数估计值上标***、**、* 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以下同。卡方值下括号内为p值,从结果来看,所有因素的卡方统计量均高度显著,说明模型是成立的。连接函数为logit模型。

（三）模型选择与计量分析结果

描述性统计揭示了中国居民近 20 年来幸福感的变化规律,并对各影响因素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卡方独立性检验,那么这些影响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影响如何,仍需要进一步的定量分析。

本文的因变量为离散有序因变量,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技术的有序因变量回归方法通常可以较好地处理此类问题,故本文采用有序回归模型。表 2 是模型估计的结果。由表 2 可以看出,人口学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影响,其结论和前面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基本吻合。从年龄来看,居民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从性别来看,女性比男性更幸福;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的人群幸福感最强,离婚或丧偶的最弱;从健康因素来看,身体状况越好,幸福感越强;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居民幸福感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显著提升。

从工作因素来看,对工作状况越满意的人群越幸福,正如文献综述中所表明的,工作不满意不仅体现在收入上,还会从多方面对幸福感产生影响,证实了工作状况是影响幸福感非常显著的因素。

从家庭因素来看,对家庭成员信任的人,则更可能幸福,一点都不信任家人的人幸福感最弱;对家庭生活状况满意的人更幸福,对家庭生活不满意的人幸福感最弱。

从人际关系来看,认为大部分人是值得信赖的群体则幸福感较强,而认为要小心为好,多多提防外人的幸福感较弱。信任度反映的是人对周围大环境的一种感受,也是对社会风气的一种评估,感觉周围的人大部分是“真善美”的人更加幸福。

从情感因素来看,经常感到孤独的人幸福感较弱;经常感到沮丧和失落的人幸福感较弱;而经常感到开心,有兴趣的人幸福感较强。表明情感积极的人更加快乐,消极的人幸福感较弱。

从经济因素来看,高收入和中收入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与低收入群体相比,中、高收入者幸福水平更高,从系数大小来看,中等收入群体幸福感最强。总体而言,中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幸福的概率更大,但不能得出收入越高越幸福的结论。学者们分析经济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往往重点考察收入因素,本文认为储蓄状况也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实证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从储蓄情况来看,储蓄越多,越幸福,没有储蓄且负债的人(入不敷出)幸福感最低。从家庭财政满意度来看,对家庭财政状况满意的人群幸福感最强,不满意的最弱。为了进一步比较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我们进行比较分析(见表 3),模型 1 是控制其他一些因素(此处主要是比较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重要性,故控制变量的系数省略),加入绝对收入变量进行的有序回归。模型 2 控制相同的一些因素,同时加入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变量进行有序回归。比较两个模型的结果可以发现,在控制相对收入后,低收入者系数的显著性下降,且系数绝对值减小,表明控制相对收入后,绝对收入对低收入者幸福感的影响减弱;对于中等收入者而言,系数变大,而且显著性增加,表明控制相对收入后,绝对收入对中等收入者幸福感的影响加强。从模型统计结果来看,加入相对收入后,拟 R^2 和模型拟合信息的卡方统计量都显著提高,表明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很好的解释作用。

表 3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较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控制变量		性别、年龄、婚姻、健康、教育、储蓄、工作满意度、情感因素、家庭因素	
绝对收入	低收入	-0.681 ***	-0.210 *
	中收入	-0.065	0.172 *
	高收入	0(参照组)	
相对收入	满意		3.163 ***
	一般		1.432 ***
	不满意	0(参照组)	
拟 R^2		0.209	0.407
模型拟合卡方检验值		890.901 ***	1 978.440 ***

从比数比的结果来看,女性更幸福的概率是男性的 1.29 倍;健康状况良好的人更幸福的概率是不健康的 6.94 倍;高收入者更幸福的概率是低收入者的 1.40 倍;对工作满意的人更幸福的概率是不满意的 6.94 倍;对家庭信任的人更幸福的概率是不信任家庭的 59.68 倍。拟 R^2 是有序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解释能力的一种量化,从结果来看,经济因素的解釋能力最强,能解释幸福感变化的 36.7%,其次是家庭因素、工作因素、个人特征因素,分别可以解释幸福感变化的 17.8%、15.3%和 12.7%。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1990~2007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处于比较快乐的层次。分阶段看,2000 年以后,居民幸福感呈现上升趋势,但和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却呈现略微下降趋势,总体而言居民的幸福感受较为稳定,表明“收入—幸福”悖论在一定程度上适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这一现象揭示了中国近 20 年所发生的变化,一方面,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生活水平不断上升,让人民普遍感受到幸福;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的发展,社会问题也日渐突出,贪污腐败、食品安全、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不公平、交通拥挤等负面现象也屡有发生,这种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的状况,大大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受。随着政府对居民幸福的关注日益加强,以及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治理,未来居民会越来越觉得幸福。

第二,居民主观幸福感受到来自人口学特征、经济因素、工作情况、家庭因素、人际关系和情感因素等六个方面因素显著的系统影响。根据解释程度,得出各个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重要性排序,经济因素是影响主观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绝对收入、相对收入都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重要性依次为家庭、工作、人口特征、情感 and 人际关系因素。

如今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不能完全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更加看重诸如健康、教育、情感、家庭、社会关系、自我价值实现等多方面的因素,只有经济增长和影响主观幸福感评价的多种因素协同发展,老百姓才可能更幸福。在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放缓的情况下,政府更需要考虑如何将经济的发展转化为老百姓其他多方面需求的满足,才可能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保障和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受。经济增长不是最终目的,让老百姓幸福快乐的生活才应该是政府工作的终极目标^[15]。因此,根据本文的分析结论,持续地提升居民幸福感受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不断缩小收入差距。研究结论表明,经济因素依然是影响居民幸福感受的最重要因素,中等收入的人群最幸福,中、高收入者的幸福感受分别比低收入者高 58%和 40%。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储蓄均对幸福感受有显著影响,收入差距扩大无疑会降低低收入者的幸福感受,低收入者更容易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故政府需要更加关注并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

第二,倡导建设“和谐家庭、幸福家庭”,构建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关系。家庭成员间互相信任、关系和谐是幸福的基础。研究表明信任家庭的人更幸福的概率是不信任家庭的近 60 倍,可见和谐融洽的家庭关系会大幅度提高家庭成员的幸福感受;构建新型邻里关系,需要社区发挥积极作用,定期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促进邻里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增强彼此信任感,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这对于提升居民幸福感受有重要意义。

第三,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积极推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提升居民工作满意度。结论表明,提升居民对工作的满意度能大幅提高居民幸福感受,工作满意度从“不满意”提升到“一般”能提升居民 83%的幸福感受,提升到“满意”则能提升近 6 倍的幸福感受。没有和谐的劳动关系,就没有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政府有责任夯实和谐的劳动关系,探索建立“党政主导、企业主体、工会运作、多方配合”的长效机制,使居民在舒适的劳动环境中,获得体面的报酬,从而更有尊严的工作和生活。

第四,完善社会保障及养老体系,使老年人的生活得到保障。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幸福感是较高的,但这种高幸福感是有前提的,即身心健康和基本生活得到保障。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老年人的孤独、贫困、疾病等问题越来越严重,极大地降低了老年人的幸福感。政府应该加大对养老的投入,采取诸如改善养老院的设施条件、发展社区托老所、对老年人进行定期身体检查、公共消费执行优惠减免等措施保障甚至提升老年人幸福感。

第五,加大医疗、教育的投入力度,使尽可能多的人更大程度上享有基本医疗保险和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研究结论表明,健康是居民幸福的前提条件,健康状况好的人群比健康状况差的人群平均幸福近 7 倍,加大医疗投入,改善居民健康状况能较大幅度提高居民幸福感;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受教育程度为义务教育水平及以下的老百姓幸福感较弱,如果受教育程度提高到高中或中专,可以提升 28% 的幸福感;如果提升到大专及以上,能提升 63% 的幸福感,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可以提升居民幸福感。

第六,加大对居民身心健康教育的力度,尤其需要普及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培养居民养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研究表明,孤独的人和情感消极的人幸福感较弱,这类群体更容易做出极端举动,危害社会。因此,政府应该建立相关机构重点关注情绪消极人群的言行,积极组建专业咨询机构,大力培养专业队伍从事心理咨询服务工作。

注释:

①不同文献中,关于“幸福”的措辞有多种,比较常见的表述有“主观幸福感”、“幸福感”、“满意度”、“愉快”、“快乐”等,经笔者阅读发现,诸多措辞并无实质差异,都是被调查者自主回答自己的幸福程度。故本文不区分其差异。

②数据中情感认知的回答选项是逆向计分的,所以此处用负号纠正,生活满意度是 10 分制计分,情感认知是 4 分制计分,故赋予权重 2.5 倍是为了平衡两者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Easterlin, R.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C]//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89—125.
- [2] Stutzer, A. The Role of Income Aspirations in Individual Happiness[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04, 54(1): 89—109.
- [3] 谢识予, 姜伶俐, 朱弘鑫. 显性因子的效用中介、社会攀比和幸福悖论[J]. 世界经济文汇, 2010, (4): 19—32.
- [4] Easterlin, R.A.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1, 111(473): 465—484.
- [5] 罗楚亮.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 财经研究, 2009, (11): 79—91.
- [6] 田国强, 杨立岩. 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J]. 经济研究, 2006, (11): 4—15.
- [7] 孙凤. 性别、职业与主观幸福感[J]. 经济科学, 2007, (1): 95—106.
- [8] Easterlin, R.A. Life Cycle Happiness and Its Sources: Intersection of Psychology, Economics and Demography[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06, 27(4): 463—482.
- [9] Clark, A.E., Oswald, A.J.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6, 61(3): 359—381.
- [10]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re Decades of Progress[J]. Psychology Bulletin, 1999, 125(2): 276—302.
- [11] Wilson, W.R. 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67, 67(4): 294—306.
- [12] 刘军强. 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 CGSS 数据的追踪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12): 82—102.
- [13] 任海燕, 傅红春. 有序概率模型的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和幸福感研究[J]. 求索, 2012, (3): 1—4.
- [14] Inglehart, R. Development, Freedom and Rising Happiness: A Global Perspective(1981—2007)[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8, 3(4): 264—285.
- [15] 鲁元平, 杨灿明.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支出偏好与居民幸福感——基于分税制后的中国经验证据[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3, (4): 3—12.

(责任编辑: 易会文)

JOURNA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No.2,Mar.15,2014

HIGHLIGHTS

Can the Market Logic that Exchange Value Is Better than Everything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Climate Change ?

LU Xianxiang

• 3 •

(School of Econom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climate change, low-carbon economy represents an initial great change in history which is chosen intentionally and based on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policies. In the atmosphere of global cooperation culture, low-carbon economy aims at building a global low-carbon economy system, taking the global ecological system into account. So far, to a great extent, green house gas emi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economy is the most severe market failure confronted by human society. Market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concerning the value and realization of ecology; market cannot resolve the problem of ecological fairness; market cannot settle the problem caused by linear economic institution; market is incompatible with steady-state economy. It follows that market is short of ecological function. Therefore, being aware of the limitation of market on climate change is beneficial for human to establish the very institution seasoning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to entitle market with ecological function. Humans are advocated to embed 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 into market economy and operate market with low-carbon development objective; hence, human society can at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eritably.

Key words: Neo-liberalism Economy; Exchange Value; Market Logic; Climate Change; Low-carbon Economy; Linear Economy; Steady-state Economy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Residents' SWB: A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XU Yingmei XIA Lun

• 12 •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Mathemat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the World Values Survey(WVS), we analyzed the trend of evaluation of the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We found that Chinese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can be explained by "Income-happiness paradox". We buil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rom the demographic factors, economic factors, family factors, work factors, relationship factors and emotional factor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found that these factors are significant in statistics. Economic, family and work factor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nd people obtain higher income, have good family relationships, satisfied with the job, have interpersonal harmony and positive feelings are happi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we must vigorously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after a certain stage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meet the increasing variety of non-material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then improve effectively the level of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Key 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come; Job Satisfaction; Family Trust